

■ 政 治

公共人: 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李 山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公共人;公共领域;公共性;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10-0074-07 [收稿日期] 2014-05-24

[作者简介]李山,男,山东莒南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与乡村政治;吴理财,男,安徽潜山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与乡村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8);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化体制比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项目批准号:13XKS01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S026)的一项成果。

现代国家治理就是以协商共识民主为机制,形成基于公共性价值诉求的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协同合作网络,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相应均衡性与互促性发展。现代国家治理固然需要治理理念与技术的现代化,但是更需要参与治理的具备公共性的“公共人”。“公共人”指的是在现代公共领域中承载着公共性并积极行动的主体。这些由公共领域培育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人”具备公民美德,追求公共利益,遵循协商共识的行动逻辑,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实质。

一、公共领域:公共人的行动场域

在政治哲学史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最早提出“公共领域”与“行动”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思考的学者。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对人类社会结构进行历史性考察,阐释了自己的公共领域思想。根据自由程度不同,阿伦特将积极生活划分为三种人类活动,即“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对应于这三类活动,人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劳动人”、“技艺人”与“行动者”。他们分别生活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中,并处于“生命”、“世界”与“人的多样性”三种基本生存境况。

阿伦特认为,劳动是与人的生物性生命相关联,单纯体现的是维持人类生物性需要的人之生存本能。劳动只关心生存必需品本身的需求与满足,而不关心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因而劳动无须展露在公共之中接受评价,不具备公共的意义,与之相对应的是“私人领域”。“工作”是技艺人在人类知识理性建构的模式指导下,运用各种技艺与工具,制作出具有“持存性”(duality)和有用性之物,从而创造一个“人为世界”的活动。

技艺人创造出的人造世界是一个介于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社会领域”,既有着私人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虽然社会领域具有公共性,但是社会领域仍受是必然性驱使的经济关系领域,屈服于人的生物性需要,并不能体现为真正的公共性和自由。

在人类三种活动中,“劳动”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之循环;工作则陷入“手段和目的”的无意义纠缠;唯有“行动”才是一种人的自由存在方式,体现着真正的公共性与自由。“行动”是一种不会带来直接外在结果的显示自身的独立性活动,既摆脱了自然界无休止循环,又不受功利主义逻辑支配。这种自我揭示的行动是建立在“劳动”与“工作”之上,并对其二者超越的最高层次的人类活动。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具有自我彰显性,每个人的个性会得到全面展现,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得到充分体现;行动具有自发创新性,无先验性规律可遵循,无法被预先决定和预测预知;行动具有人生终极性,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人生意义本身,无法用功利主义解释。由于行动完成了对人的生物规定性的反叛和超越,行动者获得了充分自由,在行动中,人们不是作为一个劳动动物而活,也不是为私人利益而活,而是为作为构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我”而活,并不断追求着人生的意义;在行动中,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涌动着让自己出类拔萃的激情,每个人充分地表现自我、揭示自我与接受他者,享受着人生的高层次快乐。这些不同于“劳动人”与“技艺人”的积极行动着的“行动者”就是“公共人”。

这个由公共人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彼此揭示自我、实现人生价值与分享人生快乐的自由空间便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公共人的行动场域,是公共人经由其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卓越和出众的公共空间,也是寻求长远人类共同利益的公共世界,“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1]“公共领域中各部分的所有活动的目标,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都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2]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概念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能够在其中自由行动的公共人相互展现各自独特性,保持个体多样性的宽容,提供个体价值实现可能性的空间范畴。公共领域实现了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的超越,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性,成为不朽实现的恒久场所。

阿伦特首倡公共领域研究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其进一步补充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分析范式和话语系统,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库中拥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哈贝马斯弥补了阿伦特仅从存在论的角度研究公共领域的缺陷,超越了其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限制,从历史角度全面梳理分析公共领域演变,在赋予公共领域合法性支撑的同时,建构起自己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从社会历史变迁维度,分析公共领域从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到中世纪封建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再到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沿革,系统阐释资产阶级的政治公共领域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3]可见,公共领域是一个基于私人领域或社会领域事务,经由对话与协商的集体行动,不断再生产社会公共性,影响国家公共权力,借以维护特定共同利益的公共空间,是公共人展开行动,超越私人狭隘利益,造就与追求社会公共性的交往行动场域。在公共领域中,公共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批判性吸收他者观点,经由协商达成共识,生产出社会公共性,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合理性论证和社会制度建构。由此可见,哈贝马斯认为,政治公共领域主要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一是自由平等是公共领域首要条件。在公共领域中,活跃着“自由平等”的个体,每个人没有等级差别与人身依附,都可以平等参与对话交流,自由表达个人看法与观点,“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附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4];二是理性商谈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在公共领域当中,公众以平等、自由、自主的身份开展交往行动,通过对话沟通、讨论争辩、理性商谈达成共识,形成公共性,增进公共领域发展活力。三是批判监督是公共领域的精髓。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个批判性场域,通过公共人的反思性批判,形成公共意志与公

共舆论,监督规范国家权力,实现公共性。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则从城市社会学的维度,梳理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阐述自己的公共领域思想。他认为,“公共”是和“私人”相对应的词汇,这个词的最早用法是同社会的共同利益与政治群体活动联系起来的。在西方世界,到17世纪末期,“公共”与“私人”逐渐演变成现在的用法。“公共”意味着向任何人的审视开放,具有公开性、透明性与可进入性,而“私人”则意味着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社会生活区域。到18世纪,“公共”一词的含义得到进一步拓展,并获得了现代意义,意指人口异质性较大的城市公共领域,“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处于家人和好友之外社会生活领域,还意味着这个由熟人和陌生人构成的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群相互之间差异比较大的人。”^[5]西方社会出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化之后,无论在行动,还是在理念上,两者都具有明确的边界。当时人们认为,公共领域是非人格化的有教养的体现着社会公共性的后天行为集合,而私人领域则可以视为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的先天行为集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一种相互补充、互相平衡的关系:私人领域是对公共领域的补充;但公共领域则是对私人生活的修正。这是因为单纯依靠家庭之爱而过的生活会产生一种“不文明”的自然缺陷,人们在私人领域只是能够实现人的本性,成为自然人,只有走进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性,才能更加卓越出众,更加文明,成为完美的公共人。

桑内特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视域来理解公共领域,将公共领域看作是一种具有实在性的日常生活场域,是由一群异质性较大的熟悉人与陌生人构成的公共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在公共领域中,人们摆脱了物质必然性与人格化情感的束缚,成为追求公共性的公共人。城市是一个熔炉,是非人格生活的工具,是非人格行动的教师,是公共人活跃于其中的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主要所在地,在其中,人们能够通过相互社会交往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利益,体验不同的感受,积极地追求自己利益;城市公共领域里,上演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展示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人们就算没有想了解其他人的冲动,也会觉得和其他人的交往是有意义的。”^[6]

二、公共性:公共人的核心价值

“公共性”是与“公”的观念相伴与“私”的观念相对应而存在的概念。理查德·桑内特认为,“公共”这个词的最初用法是同社会共同利益与政治群体活动联系起来的,最早可以在古希腊城邦生活中找到痕迹。“公共性”的理解离不开“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性的生产离不开公共人的行动。“公共性”是个与“公共领域”与“公共人”如影随形的范畴,是由在“公共场域”内生产和生活的具有反思性批判精神的“公共人”以及由其形成的公共舆论所推动的产出。对“公共性”进行系统阐释的学者主要是阿伦特和哈贝马斯。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摆脱自然必然性支配,能够充分平等自由地展现自我,追求公共价值的场域。因此,公共性是公共领域与公共人的价值中轴。在公共领域中,公共性具体体现为:一是开放性。“首先,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对于我们来说,显现——不仅被他人而且被我们自己看到和听到——构成着实在。”^[7]二是共同性。尽管公共领域具有多样性,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由个体,展现自己的卓异,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公共领域又是一个共同世界,需要在沟通协商基础上形成公共性,过上建立在多样性之基础上的共同生活。“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就是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而言。”“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8]三是自发性。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不是人类理性建构的结果,而是行动者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相互作用的产物,“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在其中,一个公共世界自行呈现,对此是无法用任何共同尺度或标尺预先设计的。”^[9]四是持久性。公共领域是一个将人们聚拢起来和彼此联系的事物共同体,让人们拥有或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比他们的现世生命更长久,在这里,公共领域生产的公共性凸显出超越私人利益追求公共利益的长远持久性。“如果世界要包含一个公共领域,它就不能只为一代人而建,只为活着的人做规划,它必须超越有死之

人的生命长度。”^[10]阿伦特曾用一个形象比喻来阐释公共性,“在世界上一同生活,根本上意味着一个事物世界(a world of 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之间,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in-between)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11]虽然每个人有不同立场,有不同视角,但是他们却总是关注着同一个对象。

哈贝马斯则认为,公共领域根本属性是公共性。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的更替,产生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性:第一种是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产生的“城邦型”公共性。在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是指公民之间进行集体交往和公共活动的政治领域,但是公民仅占少数,大多数奴隶与自由民等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所谓“自由”、“平等”地交流和交往只在公民之间才是有可能。第二种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公共领域产生的“代表型”公共性。在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古典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国王的臣民,只有那些王公贵族等拥有较高地位的人,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开化”交流平台,并经由一系列的行为规范、礼仪和象征符号塑造并展示代表性权利。第三种是近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资产阶级”型公共性。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公众获得了作为独立权利主体的公民身份,公共领域也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与透明性,具有监督批判功能的公共舆论从中开始复兴。

由此可见,在哈贝马斯看来,产生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既可是专属于少数人的封闭性领域,也可是所有人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性领域,所以公共性亦可分化为由私域的“经济人”出于满足私人或集团利益需求,借助权力角逐和利益博弈而产生的以阶级性和阶层性为特质的“形式”公共性,譬如,“城邦型”公共性与“代表型”公共性;也可能形成处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人”基于对公共事物关注与公共利益追求,借助广泛的协商辩论而形成的“实质”公共性,譬如,“资产阶级型”公共性。^[12]

资产阶级型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价值规范的彰显,是对国家权力的批判制约。“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超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13]。为了关注家庭等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同时免受国家权力干预,社会逐步形成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界定为“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由此可见,在公共领域内,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表达观点、意见、建议与批判,通过沟通协商从而形成共识性的公共舆论,生产出社会公共性。因此,公共性就是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人进行协商民主运作后的共识结果,就是公共领域内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倡导由公共人所呈现的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性就是在公共领域展开行动的公共人所欲求的核心价值。

从阿伦特与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理解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共性”应具备以下几种特性:一是公共性是一种“公共意志”。聚拢在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在交往行动中克服个体意志的工具性、消极性,并对个体意志进行反思性批判,在承认个体具有追逐个体意志与私人生活选择的合理性基础上,追求公共领域的普遍性价值与意义,强调经由持续性沟通协商达成公共意志的公共性的根本性。这种公共意志实现了个体意志与团体意志等私人性意志的批判和扬弃,不断追求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抵御私人领域的侵犯,维系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可见,公共性是超越私人意志,并更好捍卫私人意志的公共意志的内在表现。二是公共性是一种思想的多元共识。公共性要在理性讨论与争辩中形成,在多元化的共识中产生。公共领域是一个开放性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的多元化场域,里面充满了差异性、多样性与个体性的思想意识冲突与碰撞。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对这些“不一致”进行批判性讨论与反思,达成某种制度规范或价值观念的共识。共识是经由公共领域内的所有公共人共同认同所形成的,它超越了人们的各种固有偏见,体现着所有个体的价值偏好的共性。三是公共性是一种公共利益。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摆脱了谋生、必然性和不平等关系的自由领域,行动和言语出现在这里,制造着人际间的互动和交流,在展露自我的

同时,也揭示着客观存在的事情。在公共领域中,展示自我与关注公共事务,必然会形成联接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公共领域的公共利益,是公共性的一种存在形态。四是公共性是交往行动的结果。公共性并不是公共领域先天具有的,而是经由公共领域自由平等地协商所达致的一种状态。在公共领域之中,拥有平等自由的主体地位的公共人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往行动,充分表达各自观点与看法,运用协商和谈判的理性民主方式,达成整个公共领域所共同认可的共识,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

三、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简单而言,所谓“公共人”就是在公共领域中,追求并体现公共性的活动主体。在阿伦特看来,公共人是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平等地展开行动交往,创造积极生活方式,并追求人的存在价值与再造公共性的积极行动者。活跃于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者就是公共人,公共人在创造公共领域的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奠定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可见,治理是一项展开协商,达成共识,协同合作,追求公共性的公共人的集体行动。治理需要由公共人的交往行动建构的公共领域,需要由公共人的理性商讨生产的公共性价值,更需要构建公共领域与培养公共性的公共人。由此可见,治理需要行动着的公共人基础,离开公共人的行动就不存在治理。现代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政权领域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领域的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因此,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大量公共领域以及在其中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人存在,否则现代国家治理可能由于缺乏积极的行动者而无从谈起。

(一)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基于公共人的协商共识民主

现代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是否具有科学性、合法性与可行性则取决形成公共政策的民主程序的合理性。协商共识民主是产生公共政策的良好有效规程。协商共识民主是对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缺陷超越的“第三种民主”模式。为实现有效制衡公共权力与维护个人权利的目的,自由主义民主将公民视为独立于社群之外的独立个体,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性的达成以简单多数原则粗暴压制理性少数,理性审慎失去位置,多数的暴政扼杀个体价值,公民政治参与普遍性缺失,公民政治冷漠成为理性选择。针对自由主义民主缺陷,共和主义民主进行了修补。共和主义民主强调,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普遍性的政治参与,主张通过公民讨论、协商等方式决定公共规则和公共决策,形成广泛的政治认同。但是,建立在公民“在场”的直接民主难以做到制度化,依然无法在整体上代替代议制民主。

公共领域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空间场域,通过公共人公开自由的普遍交往和理性商谈达成有关公共事务的普遍共识,借以影响公共权力运行。在公共领域中,公共人可以就某项法律或政策主张提出具有充分论据的支持或反对意见,以事实依据说服其他参与者,在经由平等自由地对话、辩论与说服过程后获得相关议题的一致性共识,生产出协商共识的公共性,并以这种公共性捍卫协商共识的合法性。可见,这种协商共识民主建立起一种理想的商谈决策程序来联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现二者的协调融合,推进现代国家治理。协商共识民主能够让公共人公开表达某项政策的偏好和理由,在公共人充分协商讨论基础上,通过辩论、对话的批判性过程,每个公共人都可以有机会审视整个协商过程,避免可能的矛盾或事实上的疏忽。由此可见,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人的公开性与开放性特质既强化公共人共识约束公共权力观点,又能够养成经由协商处理分歧形成共识处理公共事务意识。公共领域的公共人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特质,能够保障力图经由对话和沟通的共同协商而非强迫接受他者要求与目标,促进公共人或其构成的公共组织的批判性反思,增进较深层彼此理解与互信,奠定共同政治行动的社会基础。协商共识民主鼓励每一个公共人都应基于自己独立性地位表达意见,而不受任何所谓主导性意见之左右,在相互理解彼此差异基础上超越各自狭隘利益,形成更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决策。

(二)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基于公共人的公共舆论监督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政治权力是产生于社会的需要,并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异化的产物。政府国家向社会回归,并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现代国家治理必须要使国家政治权力服务于社会存在发展,并应受到社会及其构成者民众的制约监督,保障政治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行使,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共性。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并调和平衡二者的中间地带。在公共领域中,公共人自由和公开地言说表达关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与观点,经由协商共识形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舆论。这种源于公共领域的公共舆论能够产生出普遍性的影响力与说服力,从而会对公共权力以及国家政策进行批评性监督并形成压力,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保障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有效推进现代国家治理。

由此可见,基于公共人的公共舆论能够形成一种民主监督机制,保障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公共领域的特征毋宁是在于一种交往结构……是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14]。公共舆论主要是一种在公共领域内由公共人的行动交往而产生的话语权的表现形式。公共舆论会影响但不会取缔制度性权力体系,而是凭借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以言说形式的“围攻”的方式对公共权力及其制度化形式施加批判性监督,将公共权力运行置于社会的直接监督规约之下,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或导致腐败。“公共领域是通过社会公众的社会文化交往网络形成公共舆论,达致公共理性,进而转化为国家行政权力或对公共政治权力系统形成若明若暗的现实压力,从而发挥其监督制约公共政治权力和推进政治民主进程的作用。”^[15]

(三)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基于公共人的社会组织合作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合作网络,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多元化的系统世界,任何单一部门都无法拥有充足的能力与资源,可以独自解决所有面对的问题。实施国家治理需要具有团结互助精神的公共人采取有效的行动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处理,更需要私营性部门、志愿性团体与社区互助组织等各种以社会组织形态呈现的公共领域的蓬勃发展,积极参与到现代国家治理,并依靠自身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目前现代国家治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公共人等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言:现代国家治理是指公私机构、自愿社团与公共人等行动者相互依存、共同合作与彼此团结的网络。

物理性公共空间是人类最早出现的公共领域形态,但是随着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公共事务日渐多样化,在物理性空间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一定纽带为联结的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公共领域。一般而言,社会组织也是介于供给公共物品的公权部门与生产私人物品的私人部门的中间社会结构,譬如,各种非政府性组织、非营利性团体、民间性协会与宗教性团体等等。这些社会组织通常具有志愿性、自治性、公益性和互益性等特征。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社会组织搭建公共人参与公共事务有效舞台,公共人在社会组织中制定组织章程与公约,策划实施公共活动,发动群众加入公共生活,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公共人在社会组织的公共行动中,运用对话、协商与妥协等交往形式,处理彼此存在的分歧,达成集体合作行动的共识,培育出公共性,形成共识下的团结互助合作精神。同时,公共人又依托特定社会组织对于某些社会公共话题发表各自观点、看法与建议,经由合法渠道展开商讨协商,并以社会组织为载体进行集体性交往行动,输出具有共识性的政治产出。基于公共人的社会组织能够内生出互惠互助合作的“社会资本”,防止社会制度和价值碎片化,促使各类特定社会组织能够相互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领域,在维护自身社会组织共识中同社会组织商讨,产生更多的交叠共识,形成一股联合性力量与认同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对抗公共权力的入侵,保障公共权力按轨运行,增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实现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同时,各种社会组织间相互协作,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形成多中心的公共协同行动体系,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四) 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基于公共人的社会自治体系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全能性管理,而是需要最大限度的下放权力,给予社会充分自主发展空间,培育社会

自治能力,保障社会自身活力。社会自治意味着特定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人在免于外部权力干预下根据所处空间场域的特定生态条件,制定因地制宜的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社会自治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主体意识,调动公民社会参与积极性,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担当,增进社会公共精神,塑造公民政治认同与社会团结,促进经济社会稳定;社会自治能够极大减轻社会管理负担,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增强国家治理绩效;除此之外,社会自治还能够形成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对抗国家权力非法入侵,驾驭国家权力的非分之想,建立起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均衡。由此可见,社会自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保障。

社会自治需要大量公共人与由其行动期间的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自治主体是广大公民,社会自治程度则取决于由公民转化成公共人的数量,而公共人的民主素质与行动能力又直接决定着社会自治水平。公共人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着自由平等地交往,不存在意见权威,也没有观点强制,公共意志是经由多层协商交叠共识达致的结果,在这里公共人养成社会自治所需的民主习惯。同时,在公共领域交往行动中,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自我观点,展示自我意见,在不断揭示自我过程中耐心倾听别人看法,站在别人立场上换位思考,在这里学会理性的批判性思考。此外,公共人在公共领域中自我缔结规约,自我参与公共事务,自我处理公共问题,从而培养出自我管理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公共领域还能够培育出追求公共美德,践行公共性、具备公共意识、具有互助合作精神的公共人。可见,公共人拥有“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 and 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可能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16],具有社会自治所应具备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能力会不断累积并强化公民现代政治知识的发育成长,推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友好合作。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这种自我管理并非是无政府状态的各行其是,而是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展开。在公共领域中,公共人往往作为各类社会组织成员参与公共活动,如此以来,公共领域内自由平等公共人之间的辩论和协商,自然会演化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之间的协商行动。由公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的高度自治程度与完善自治能力催生出一个健康的具有独立性 with 自治性的公民社会,奠定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根基。

总之,公共领域固有运作逻辑及其构成主体公共人的特质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内在机理与社会基础。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联结沟通国家政治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成为推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17]在公共空间中积极行动着的公共人所营造的公共性凭借公众舆论、社会批判等形式监督制约国家政治权力和其他社会势力。公共领域的运转以及公共性的生产都是现代国家治理所追求的重要内容;而公共人又是使公共领域与公共性运转起来的主体条件。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至为重要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A].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上海:三联书店,2005:73.
- [2]Margaret Canovan, Politics as Culture: Hannah Arendt and the Public Realm, in Hannah Arendt[J].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 188.
- [3][4][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1999:32,41,23.
- [5][6][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9,426.
- [7][8][9][10][11][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32,34,38,36,34.
- [12]高红.公共性的产生与公共性的生产[J].学海,2011(01):213.
- [14][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446.
- [15]杨仁忠.论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36.
- [16][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80.
- [17]杨仁忠.公共领域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3.

(责任编辑:郭洪)